

抓住「十四五」機遇 盡早與「雙循環」接軌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正在舉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並就《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

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十四五」規劃關乎未來30年國運，既應對國際大變局，亦要實現中華復興大業。香港宜掌握這次機遇，發揮其為內地提供的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從而彰顯其難以替代的獨特角色和價值。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合會常務副會長

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特別是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中央審時度勢、沉着應對，「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即將完成，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台階。

大灣區有落實「雙循環」戰略天然基礎

為了應對美國的遏華戰略，五中全會聚焦「雙循環」發展模式，經濟布局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發展。香港應以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為依託，盡早研究和部署實現與國內國際市場「雙接軌」，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及國家「十四五」規劃，這將是香港經濟復甦和未來發展的關鍵。

面對國家經濟戰略轉變，香港要盡早參與、了解並把握好「十四五」規劃所帶來的新機遇。擘畫「十四五」藍圖，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香港與深圳都是大灣區的重要引擎，在科技合作方面潛力巨大，最重要的是改革創新，融合發展。

在國際壓力劇增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向「內外雙循環」轉軌的大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經濟活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具備落實「雙循環」戰略的天然基礎。而香港更是大灣區內經濟內循環與外循環的一個重要介面，將會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帶來巨大的機遇。

港要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重要國家戰略，相關

金融支持政策正不斷加碼。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應在推進金融互聯互通、投融資便利化，促進資金要素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等金融優勢領域，為大灣區建設提供有力支撐。香港要堅持「一國兩制」的獨特性，善用香港擁有健全法制、優秀專業服務、先進科研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優勢，未來在粵港澳大灣區繼續幫內地企業融資和走出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並透過優勢互補，將香港科研成果產業化，破解空間局限難題，推動科創中心發展。

此外，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可扮演多方面角色，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區域貿易中心、物流及航運服務中心、調解仲裁中心、基建服務整合中心、環球投資中心等。

目前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實行全民強制性檢測，

找出所有患者並隔離治療，才能真正切斷病毒傳播，新增病例歸零。香港已有分區自願檢測經驗，再做全民強制檢測應該不難。惟有新增病例歸零並維持一段時間，香港才可盡快落實健康碼，恢復兩地通關，為香港接連「國內大循環」市場創造條件，社會經濟才能全面恢復正常運作，才能實現與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融合，促進香港與大灣區貨物、服務、資金、人員和資訊的流動。

香港若能充分發揮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中「雙循環」中的節點作用，抓住「十四五」機遇，發揮自身優勢，定能在促進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良性互動的同時，改革自身產業結構和經濟弊端，扭轉經濟發展頹勢，找到經濟復甦的增長點，重拾輝煌。

徐是雄 教授



創新是引領發展及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最重要動力。因為創新不但可以提供高質量的科技供給，還可支撐和引領現代化經濟的發展。

但對香港來說，創新落在內地和世界先進國家的後面，只需要與深圳比較就一清二楚，香港必須急起直追。香港最需要做的是，對教育徹底改革，改變現在與時代脫節的教育體制，引入培養人才的新思維和新方式。

香港不能再讓一些破壞「一國兩制」的所謂教育界人士，長期左右年輕人的思想，應盡快把教育引回正途。具體來說，香港的教育落實愛國、立德、守法、理性的正確理念之外，還應大力推動創新理念及創新。

現今香港經濟發展主要靠服務業，但香港的服務業（除金融業之外）都已太「老套」，欠缺新增長點。如果再不與時俱進，作出有效改革和自我提升，香港將前途黯淡。借用香港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劉顯倫的話，我們需要為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作出選擇，「要麼成為大灣區與外界閃耀的紐帶，要麼成為華南海岸一個微不足道的中小城市」。

對香港來說，提升服務貿易，發展優質的數字化服務，對促進內地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就拿旅遊業來說，數字技術將推動各國旅遊業不斷創新，提升旅遊設施的智能化水平，使全球旅遊的

數字化進程加速發展。線上預約、行程安排、網絡購票、線上線下融合服務等數字化服務，將成為新時代常態。

在金融服務，香港可發揮更大作用，金融數字化的發展前景無限。特區政府必須立刻行動，全面構建數字新經濟的基礎，與全世界通過數字技術連結起來，開創更多新的服務業增長點、引領點、超前發展點。

有人可能會擔心，加快科技創新會否影響香港傳統文化、藝術的發展。我認為不會，反而能促進傳統文化、藝術的發展。因為創新科技，不但能協助文化、藝術提升至更高水平，還能為文化、藝術提供多樣性、高質量的內涵，提高各種表演形式的變化力，讓科技與藝術融通表達演繹，加大傳播的力度和廣度。

另一方面，由於科技與文化藝術的結伴發展，兩者互動產生協同作用，更能激發新商業模式出現。例如新媒體、動漫、遊戲、電競、短視頻等。在這些方面，香港必須先在思維範例作出調整，不要故步自封、墨守成規、不求進取地看待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而應用創新思維，把新媒體、動漫、遊戲、電競、短視頻與傳統文化藝術相結合，創造創新理念及文化藝術融為一體的新產業新產品，這是香港發展的方向。

肖凱 上海市浦東新區政協委員 香港北區工商業聯合會創會會長



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顆璀璨明珠，不僅是中國崛起的時代縮影，也在新一輪高水平開放發展中被寄予了新的期待。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深刻總結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明確提出了深圳新時代發展創新的要求，聽完習主席的講話後，筆者心潮澎湃，激情滿懷。

中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依靠創新驅動。深圳和香港在人才、科技等要素上具備優勢，如能不斷融合發展，並帶動大灣區整個城市群為科技創新提供土壤，定會實現真正的創新驅動。作為香港教育機構代表，筆者明白年輕人非常願意嘗試新東西，亦十分鼓勵年輕人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勇敢去拚，夢想總會實現。近年來，內地選擇機會多、就業平台大、企業加速國際化等因素，加上粵港澳大灣區推陳出新地促進創業的政策措施，吸引越來越多港澳青年關注內地，並吸引到灣區就業、創業。

香港是東方明珠，深圳是中國的科創之都，兩地融合發展，必然會產生更大合力和活力，進而促進各自發展。一方面，深圳40年的發展離不開香港科技、人才和法治等要素和優秀經驗；另一方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離開了內地也會受到很大影響，因此，深圳和香港兩個城市是相互依賴的。兩地的輝煌成就離不開互相幫助、合作共贏。

內地疫情穩定後復甦明顯，深圳

處於中間地帶，通過與香港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資源能夠實現國際化配置。筆者預料，日後將有很多香港人才願意去內地工作，也相信灣區特別是深圳，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創新」是習主席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可見深圳唯有創新才能帶動企業轉型，帶動產業升級。筆者相信，香港與深圳是一對優勢互補的好兄弟，可繼續寫來「雙城故事」。香港多年來培養並匯聚了不少科研人才，如今正好透過大灣區這個平台，加強與深圳及內地各城市的合作，以便香港善用粵港澳的發展契機，推動高科技的產業化發展。深圳的優勢在於技術研發方面，目前已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因此深圳應該更多依靠自身條件和功能，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政商環境，孕育出更多的像華為、騰訊這樣的世界級企業，未來不僅要在地區層面與港澳地區深化對接、協同發展，充分發揮輻射、支撐和帶動作用，探索創新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所適配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模式，同時也應充分發揮高質量發展下全球性新標杆作用，成為新發展浪潮之下打造智慧城市、發展數字經濟、實現城市可持續和諧發展的全球新標杆，助力國家建設更加開放的創新型國家同時，也將為世界帶來更多發展機遇。

擁抱創新是香港唯一出路

港深創新驅動助港青年創業

政治狂熱分子脅持教育為禍無窮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近日一名小學教師在教學中宣揚「港獨」而遭除牌，事件備受全城熱議。涉事學校九龍塘宣道小學校長發信予家長，盼各界以學校福祉為大前提，給予時間撫平傷痛，讓學生可以在寧靜的環境下繼續學習。與此同時，聲稱是校友的則發起聯署，斥教育局「把香港教育政治化」，更表示將全力支持涉事教師採取上訴及司法覆核行動。

姑且勿論事件將會朝什麼方向發酵，但由各界的反應看來，似乎大家都反對教育政治化，響應筆者「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的原則。社會如能有這樣的共識，本是好事一樁。奈何現實卻是殘酷的，眼下有一個比教育政治化更大的危機，擺在面前！

在政府啟動修訂逃犯條例之初，在各方政治勢力的策劃下，事件演變成政治海嘯。在這場海嘯之中，部分老師、學生、

校友和家長都受到影響，將政治帶入了校園，在這樣的政治大氣候底下，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這只是一時的風浪，這種政治化趨勢也應只是短暫的。隨着海嘯退潮，各方都冷靜下來後，校園政治化的思潮也可望一併退下。

然而，眼前一個更可怕的危機是，教育不單只被政治化，而是被意識形態化！觀乎近年的社會事件，我們不難發現一種表徵，就是個別的人將自己的政治理念擺放在人生的最高位置，政治是最高人生價值，然後不顧一切、不擇手段、不理後果地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結果，有教師因為這種意識形態而不顧教育原則，忘掉育人初衷，只要他們認為是政治正確的，便不惜一切地衝，不但自己衝，還鼓勵甚至帶領學生衝向最前線。為了共同的意識形態，一些號稱專業的組織，也義無反顧

地給予包庇袒護。

常言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健康的政治環境，容納不同的向度，包含談判和妥協的空間。若一旦發展至意識形態化，則失去迴旋的餘地，往前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必須警惕意識形態化比政治化更可怕！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早前說要在教育界清除「壞蘋果」，拯救學子免受荼毒；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說要揪出「害群之馬」，免貽害學子。於我看來，教育界更大的危機在於政治狂熱的意識形態化，正在為另一場隱形的巨型瘟疫揭開序幕，如果我們無法及早清除病毒，任由蔓延，任由傳播感染，任由教育體制內的各種「政治狂熱分子」以不同份份者的姿態脅持校園，那麼，由政治狂熱分子培養出來的，必定是一批批恐怖分子，禍患無窮。

抗美援朝推進中國軍事現代化

許楨 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早前，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參戰老兵、烈屬成為該場紀念活動的主角。當年一場戰爭，不只深刻影響其後國運起伏，也決定東亞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格局。從1930到1950年代的20年間，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抗美援朝，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中國現代革命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一直發展到今天。

可以說，1930年代之前逾半世紀，中國的主權構成、政權屬性，一直在激烈搖擺、不停衝突當中。這正是清末以降，中國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現代化進程最根本的區別。中國的國際地位及現代管治體系，是在上述三場大規模

戰爭的煙火中不斷建立。而在重建、鞏固、提升民族自信心方面，抗美援朝戰爭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樣，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因為屬於出國作戰，其規模也稍小，抗美援朝戰爭在香港學界、教育界、民間未受到全面而深刻的體會。其實，在軍事層面，雖然志願軍與聯合國軍有明顯的裝備差距，然而，中國軍隊首度成建制、大規模使用噴氣戰機、坦克等武器，上述技術與裝備突破，不但確保作戰效果，更重要的是，反映在裝備差距拉近情況下，增強了中國抵禦外敵的取勝把握。

經此一役，讓中國在1950、60年代的國際政局和安全態勢中更有自信，戰後更推進了中國現代化軍備的生產研發。可以

說，抗美援朝的戰果與經驗，確定了此後70年至今解放軍工業化、技術化、專業化的發展原則。以噴射戰機、坦克為起點，在抗美援朝之後，中國軍工體系在消化蘇聯技術、型號之同時，也開展了戰略武器的自產自研。在此後大半個世紀，無論國內外情勢如何，解放軍機械化、重裝化、技術化的歷程從未中斷，人員編制則在持續輕型化。

早在抗美援朝之前，解放軍陸軍部隊就計劃從逾500萬裁減到300萬以下。以鴉片戰爭為起點，在烽火連天中推進改革，本來就是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最大特點與難點。經過70年的發展，到今天，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潛在對手，可以在技術、裝備層面將中國軍隊拋開距離了。

美國豈會為台灣而戰

余晶焯

隨着美國大選進入關鍵時刻，台灣問題再次成為焦點。哪怕不怎麼熟悉兩岸事務的人也知道，美國視台灣為牽制中國大陸的重要棋子。失去台灣固然是美國的重大損失，但台灣畢竟只是美國的額外收益，失去台灣並不會損害美國的根基。相反，台灣攸關中國切身利益，美國為台灣而戰必將面臨中國軍隊的殊死一搏。在得不償失的情況下，美國始終不會為台灣而戰。

在美國多年「悉心照料」下，台灣已成為其參與亞太事務、對華博弈的重要棋子。這枚棋子為美國帶來了五大收益：其一是美國對台高價出售武器，從台灣身上賺取了巨額財富；其二是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重要節點，作為阻礙中國掌控台灣海峽這條交通命脈之餘，也可牽制中國在南海及西太平洋的戰略投送；其三是台灣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抓手，也是長期以來致力演變中國的前沿基地；其四是台灣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支點，增強美國某些重要地區的影響力；其五是台灣問題迫使中國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妥協。

中國大陸從一窮二白到經濟騰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國際影響力逐步增加。對於大陸而言，不戰而統一台灣，不僅經濟代價最小，而且可避免兩岸民眾因興起干戈而互相仇視，也避免國際社會激烈反應甚至制裁。大陸於2005年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列明三種對台動武的情況：第一是「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第二是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第三是和乎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因此，中國駐美公使曾警告美方，「美國軍艦抵高雄之日，正是解放軍武統台灣之時」。可見除非台灣宣布「獨立」，或者美國現在就推動台灣「獨立」，否則維持現狀，從情感上來說雖不是中國的最優解決方案，但仍是合理的選項。隨着中國進一步發展壯大，以至美國即便想介入台海局勢也有心無力時，和乎統一就水到渠成。

美國作為大英帝國世界霸權的繼承者，汲取了「日不落帝國」衰落的教訓之餘，充分學習了英國的外交權術，尤其是「離岸平衡」術。離岸平衡的精髓在於「平

衡」，即不任由一方坐大，而是通過兩強互相牽制而從中得利。

英國的「離岸平衡」主要針對法國和德國，而美國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拉攏中國抵消蘇聯的威脅，都是如出一轍。美國在海峽兩岸正扮演了兩頭下注的平衡者角色。例如美國與大陸建交後，卻又訂立了《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成立「美國在台協會」，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廢除《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後，維持與台灣除外交以外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聯繫，企圖維護實質上的美台半官方甚至官方關係。

美國通過「戰略模糊」為其兩岸政策提供彈性，以往在不觸碰大陸底線、避免中美爆發戰爭的情況下，盡可能從中牟利。但是，縱使台灣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但其最終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一旦介入台海局勢，即等同與大陸開戰。戰爭作為一種投資，美國這個投資者在決定前就必須權衡利弊。若想知道「美國會否為台灣而戰」，就要先解答「美國為台灣而戰能否帶來淨收益」的關鍵問題。這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